# 翻译跨学科之悖论

贾洪伟

（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英语部，北京 100048）

［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翻译学者逐渐产生学科意识，开始以科学方法探究以翻译为对象的真知，建构具有体系性、客观性、科学性的独立学科，同时提出翻译的跨学科或多学科理念。文章一方面以翻译的广义内涵为切入点，以翻译在历史上的发生机制为依据，引入翻译就是符号转换行为与过程的观念，阐释翻译及翻译研究在历史长河中的存在态势；另一方面从文本符号转换和跨学科路径研究翻译的角度，讨论今日跨学科是翻译的宿命，亦是历史的悖论，指出翻译研究中所谓的其他学科方法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共有工具，且翻译行为、翻译过程、译本是符号行为、符号过程、符号内容/形式，揭示带有多学科文本关系和印记的翻译研究实际就是人类认识自身及客观文本世界所做的关联性研究，即翻译研究本身所具有的普适性本质属性。

［关键词］ 翻译；跨学科；宿命；悖论；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OI］ 10.15883/j.13-1277/c.20170402804

## 一、引言

纵观翻译思想史文献，翻译研究历经语文学、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比较文学、比较风格学、文化学、阐释学、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诸多阶段，逐步走向多学科综合的理性研究路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翻译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跨学科研究范式，并公认为这是一大创新。

倘若埋头于故纸堆，细细爬梳与翻译相关的史实与思想，就不难发现所谓的翻译跨学科研究不但是一大学术悖论，而且更是翻译之难以避免的宿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翻译行为是以语言符号转换形式传送与该行为无关的思想内容。这从本质上就注定了翻译是语言符号承载信息的手段和途径，也注定了翻译与其他学科信息必然结合的宿命，这又是自翻译诞生之日就存在的必然前提。因而，要对翻译现象、翻译行为、译者意图、译作评估、翻译过程、翻译能力、翻译培训、翻译市场、译作接受度等加以研究，势必要借助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或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虽然这是翻译发生及其研究之宿命，却以一种哲学认知悖论的形式存在。

## 二、翻译的历史生态

自人类降生之日，符号就随之诞生。人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业已出现符号的阐释与转换。待到书面文献出现，因信息交流和朝廷传通之需，公元前的人类世界就已经出现符号文本的转换行为，这属于狭义的翻译行为。[1]94 从广义层面的“理解即翻译”[2]“对话即翻译”[3]“所有的写作都是翻译”[4]“原文本重写即翻译”[5]“任何话语实际上都是翻译”[6]等角度看，这种符号的交互使用已经构成翻

［收稿日期］ 2017-03-10

［作者简介］ 贾洪伟（1977—），男，哈尔滨人，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后，《语言文化研究辑刊》执行主编，大同大学许渊冲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译行为。因而,公元前 200 至公元 700 年之间,时人以番僧、武则天等为参考塑造佛像属于有形符号之间转换的翻译行为;为了取悦皇帝,朝臣翻译《越人歌》《匈奴歌》①等也属于有形符号之间转换的语际翻译行为;汉代扬雄、刘慎等将编制辞书的构想付诸实施属于将无形的思维符号转换为有形文字符号的翻译行为。

但是,就翻译发生与翻译行为/过程而言,前述种种现象虽然都是以符号为载体而呈现的宗教、诗歌等文本内容,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跨学科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受翻译行为/过程之发生本质,以及作为符号转换的翻译所处的历史生态所决定的,这又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同时也是翻译的宿命。

若以古代学术生态(不论是先秦还是古希腊)为参考,翻译行为的跨学科本质上就是悖论。先秦时期,甚至在周代,朝廷培养通才,故文人是通才,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达人和,洞晓阴阳,兼通八卦,知奇门,用遁甲,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孔子论政之余,整理《易经》,倡导语言规范;荀子论政治,论人生,论社稷,论语言规范;庄子论人生,述伦理,阐天理;孟子论心学,论行为,论人生;韩非论法理,论社稷,等等,无不涉猎人生各部学问。昔日圣贤之间的沟通与论道,从语言符号输入、解读(符号阐释)与产出的角度讲,都属于广义范畴内的翻译行为,又因昔日圣贤所学与所论均融哲学、文化、军事等各部于一体,故广义的翻译行为也必然是人类符号与今日各学科内容的综合体,此乃翻译行为的必然宿命。古希腊时期亦如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名贤,无不精通数学、逻辑、艺术、哲学等知识,时常是博学之士论学于市井之间[7]。诸贤在辩论之时,产生的思想解读与思维碰撞,也属于前文所言及的广义翻译行为。

前述可见,广义的翻译发生机制本就是今日所谓的跨学科事件。不但如此,中国古代举凡述及翻译的行为、规范与旨归,必然涉及其他学科内容②,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语言符号与文化习俗的融合(维特根斯坦称之为语言生活,皮尔士称之为符号习惯)。三国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先厥义,是则为善。”[8]377;又有南北朝时,道安从文体方面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8]52[9]79;至唐朝,玄奘从文法角度提出“五不翻”原则[8]52等,从梵汉语言特征、行文规范、佛教用语、文本体裁等角度,详尽地加以阐述,这已经是今日文学文体、对比语言学、宗教等融为一体的规范译论系统[10]65-66,不但印证了翻译行为、翻译规范等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其他学科内容这一固有的宿命(可参考知识全息的理论观点③[11]38-42),同时也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翻译跨学科研究近现代起源说的悖论。可是,此类现象是否属于跨学科所指范畴颇为令人质疑,毕竟这只是针对符号转换活动中因文体风格迥异而从内容层面做出的形式规范行为,并未走进或促生他者学科的内容,如本文有关符号转换的本质脚注所示。

## 三、学科分化进程中的翻译跨学科悖论

如前所述,翻译的发生必然借助人类符号(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传送人类社群所需的思想,其本质是人类符号与今日其他学科内容融合的信息载体转换。但是,从翻译作为人类符号行为来加以独立研究的角度讲,翻译研究这一跨学科视角④古已有之,并非近现代之发明,只是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体系化、科学化和客观化,必然随着作为独立现象和行为之研究进程的不断演进,逐渐地与现代学科理论和方法融合,这是这一现代化科学思潮发展所出现的必然学术现象和倾向。从国内外学者[12-13]的持论和翻译跨学科研究的提出历史看,翻译跨学科研究的侧重对象并非指称翻译的发生机制,而是翻译行为、过程、现象、能力、评估等层面的研究。

人类早在公元前二三百年前就零散地归纳过翻译实践的经验,只是不具备今日的理性化、系统化的学科化特征,针对翻译行为与相关现象的理性而科学的探索直到近代才出现,学科化的理性探讨更是 20 世纪中叶的学术事件,迟滞七八十年代国际学界才思考学科化的构建工作。随着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融合与发展,知识越来越专业化,遂而出现独立体系化、层次化、结构化分明的专门化知识系统,但不论谈什么主题,现当代学人在本质上并未比古代贤人先进,而是依然遵循传统的精华范式,从横、纵角度加以多视角的考量。就翻译跨学科研究而言,翻译行为根植于语言文化,系语言转换现象,无固有理论,所涉及内容与翻译过程与行为无关,这三个因素

决定了翻译研究所谓的跨学科命运，可从现象发生、译者行为、译者能力、译者意图、翻译过程、译作评估等，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忠实与不忠实等，研究本体、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等角度加以讨论，翻译研究就必然要与语言学、文学、信息科学、符号学、美学、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注定了翻译研究所谓的跨学科宿命。

翻译学者或语言学家以对比语言学探究词汇、术语、语句等微观层面的等值与对应关系；以篇章语言学探讨篇章整体层面的布局、衔接与连贯；以语料库语言学探寻共时与历时文本的对应衍义关系与规律，以语用学和文体学原理制订译本评估模式；文学与比较文学家以文本信息传递与发生效力角度，对译文美学、译本性质（即文本重写）与译者行为加以多元综合考察；结构主义学者借用信道理论考察翻译过程中信息的传输过程、模式与规律；符号学者以符号学理论考察符号转换和符号文本阐释的本质、路径与规律；美学家专注于文学文本中美学质感的再现与创造，考察文本之美的间性差异；翻译学者或心理学家采用有声思维方法，考察口译过程的心理思维模式、译者处理策略、情绪与心理基础影响等；史学家以学科史学视角书写翻译标准演化路径，以及翻译事件、翻译理论思想、人物志等，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评述各类思想的渊源关系与优劣，等等。这一切无不是将具有现代科学印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融入翻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之中，给人一种跨学科和多学科共生的假象。

## 四、翻译研究的本质论

上文之所以认为这种所谓的跨学科共生是一种悖论或假象，是因为译本既是符号形式又是符号内容，前者不论是包含何种内容都是以符号形式存在的，后者不论承载什么学科内容，也都是符号的现实指称对象和译者作为阐释者的解释项结果。从这一角度说，翻译/译本之发生实质上就是符号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而翻译过程就是符号指称过程或曰符指过程和阐释过程，因而翻译行为、翻译过程与译本三者之间就是符号行为、符号过程、符号形式/内容之间的关系。与前文观点类似，从翻译发生机制讲，不论是从符号学角度看，还是从发生的构成要素看，翻译行为、翻译过程、译本与译本内容本身都不是跨学科事件，因为从始至终翻译研究只是以其他学科视角和方法考究翻译问题，并未踏入其他学科的本体内部。

学界大多学者认为，近现代翻译研究属于跨学科或多学科共生行为，或逐渐走向跨学科[12-13]，但也有学者从本质上反对这一观点[14-15]，所据出发点为数理逻辑这一人类共有知识之母源。从符号学角度看，不仅仅是针对翻译过程、翻译行为、翻译规范、译者能力、译作评估等的研究，就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也都是符号承载的内容，这些研究无不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研究方法，只是因为研究的本体、对象、目的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已。从这个角度说，翻译研究就是使用人类共有的探知世界方法，探究人类符号行为、符号形式、符号内容、符号对象、符号过程、符号意指的专有研究，只是人类综合地认知自身与文本世界关联之整体的一个侧面，与其他学科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可以说，翻译研究乃是人类大同的共性化研究的“冰山一角”，并非是什么跨学科或多学科融合，这种观点乃是人类认识自身行为与文本客观世界之关联的悖论。

## 五、结语

本文以广义的翻译界定为切入点，以翻译在历史上的发生机制为依据，引入翻译乃符号转换的行为与过程的观念，阐释翻译及翻译研究在历史长河中的存在态势，从文本符号转换和借用他学科路径研究翻译的角度，论及所谓的跨学科乃翻译之宿命与悖论，指出翻译所谓的跨学科方法乃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共有工具，各学科亦是借自他学科，非本学科所固有，从翻译行为、翻译过程、译本乃是符号行为、符号过程、符号内容/形式角度，揭示带有多学科文本关系和印记之翻译研究是人类认知自身与文本客观世界关联研究整体之部分，这才是翻译研究所具有的普适性本质属性。

包含多学科内容的文本，以及借用所谓他学科方法研究文本内容，探知世界真知，并非只是翻译之宿命，也是人类探知世界知识的宿命，这本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同时也是人类认知自身与客观世界的规律与长期积累的认识模式所限定的。因此，这种宿命和悖论是人类认识自身与世界知识之本体论和目的论所决定的。

**注释：**

① 《匈奴歌》系《匈奴民歌》的简称，并非是一首民族歌曲，有关内容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184-185 页。

② 因为举凡涉及符号转换，变换的只是符号形式，而符号所承载的内容未变，即 A→A1……An，如数理逻辑书写式所示，指称内容的 A 永远是核心，不会因为形式变换而出现两种内容结合的第三者。

③ 全息说本为物理学术语，指的是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钱冠连先生依此提出了语言全息论（商务印书馆，2002），指出语言各部门之间也存在着类似宇宙万物之间的关联现象，退而知之，人类知识体系莫不如此。譬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将语言缘起研究的心得（即语言系统、个体演变与整体之关系、语言发展过程等）引入经济学理论，开创现代经济学传统；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提出的进化学说被引入人类学、比较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等，另有自语言学引入到其他学科的结构方法、形式方法等，均可证明这一观点。

④ 按照当前学界的说法，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研究翻译的相关问题，因此这只是一个方法和视角问题，并未促生新事物、新内容，此类事实古已有之。

## ［参考文献］


［1］ 贾洪伟.翻译符号学的概念［J］.外语教学，2016（1）：94-97.

［2］ Steiner，George. 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New York an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3］ Landa，Garcia. Note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ranslation Theory［M］.Meta：Journal des Traducteurs，1995，XL（3）：388-405.

［4］ Chesterman，Andrew. 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7.

［5］ Lefevere，André.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5.

［6］ Hartama-Heinonen，Ritva. "Interpretation is merely another word for translation"：Peircea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M］// Aejmelaeus，Anneli and Päivi Pahta. （Studies across Disciplin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7）.Helsinki：Helsinki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2012：113-129.

［7］ 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8］ 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9］ 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

［10］ 贾洪伟.一部史书 功在千秋：读《对比语言学》［J］.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09（3）：63-66.

［11］ 贾洪伟.语言学乃现代经济学之母［J］.语言文化研究，2014（1）：38-42.

［12］ 费乐仁，岳峰.翻译研究目标、学科方法与诠释取向［J］.中国翻译，2010（2）：27-34.

［13］ 贾立平.翻译跨学科研究的哲学思辨［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3（6）：66-69.

［14］ 沈跃春.跨学科悖论与悖论的跨学科研究［J］.江淮论坛，2003（1）：19-23.

［15］ 孙歌.跨学科的悖论［J］.郑州大学学报，2003（6）：5-6.


# On Interdisciplinarit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ate or Paradox


JIA Hongwei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Since 1980s,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hav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interdisciplinarity or multidisciplianrity from translation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denotation and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 introduces the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as the action and process of semiotic transformation, and expounds the situation of translation *per s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rough history. It points out that today's interdisciplinarity is both the fate and the paradox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are the shared means human beings take to know and explore the real world, that translating,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versions are sign-activity, semiosis,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ext-signs respectively, and that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human being's exploration into themselves and the objective textual world, with its translation texts imprinted with interdisciplinarit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nature, contain such universal properties.



**Key words:** interdisplinarit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ate; paradox; semiotics



［责任编辑　董明伟］